

抗日戰爭中臺灣同胞的貢獻

王鏡宇¹

國家發展研究院諮詢委員

摘 要

抗日戰爭，中日兩國交戰拼的是國力，國力公認來自「國家戰略」的四個層面綜合：一、政治：意涵內政與外政，即鞏固與強化我方政權，打擊和破壞敵方政權。二、經濟：在提高我方經濟力，削弱敵方經濟力。三、心理：係指民心與士氣，乃藉由我方社會、教育與文化、宣傳展現力量，擾亂與摧毀敵之民心士氣。四、軍事：建立武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國家戰略。本文主要從政治、經濟、心理、軍事等四個層面，逐一檢視臺灣同胞參與抗日戰爭行動之實況，並客觀顯現其對抗戰的具體貢獻及影響。

關鍵詞：國家戰略、林獻堂、六三法、臺灣義勇隊

¹本文作者為國家發展研究院諮詢委員。

壹、前言

抗日戰爭是一場中華民族三千年來，未曾遭遇過的攸關存亡絕續的戰爭。此戰，「勝」固非從此轉危為安，永絕後患；「敗」則必定淪為異族的奴僕，將永難崛起。因為當時的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後已歷經近百年的困頓與挫折，在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之下，早已國力日竭、國防盡失、國門洞開，兼以內政不修、朝綱敗壞，民生凋蔽、難以為繼，實已淪為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次殖民地」的地位。

面對如次岌岌可危的情勢，國軍雖經過東征、北伐之役，結束了軍閥割據，卻無力抗衡盤據在中國領土上的列強惡勢力。當國家元氣初復，復興契機方甦之際，日本軍國主義者挾其自明治維新以後的「西化優勢」，全面狂撲而來，並打著「三月亡華」的旗幟，在中華大地上招搖，如入無人之境。為了民族的絕續存亡，也為了炎黃子孫的前途命運，只有團結一心，奮戰到底。所以說：「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所掀起的是一場民族聖戰，而這場聖戰，正是由全國軍民同胞以決死意志所鋪成的。

滿清政府自 1895 年甲午戰敗後，雖割讓臺灣給日本，卻割不斷臺灣島上，中華民族的血脈、文化、親情。要救臺灣，必先救祖國，要救祖國，必須打敗日本帝國，於是臺灣人民同樣秉持著救國救民之志奔赴了這場民族聖戰，並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貳、從「國家戰略」論臺胞之抗日貢獻

回顧這段臺灣同胞積極參與抗戰行動的歷史，是具有極其深刻意義的。如歷史學者戴國輝所著《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²、《臺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³；許介鱗的《臺灣史記》卷一到卷四⁴，即已明白揭示日本割據臺灣，在乎的是臺灣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資源，並非臺灣人。所以日本所謂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曾建議日本政府若是臺灣人不服統治即視為醜類，全部殺光或丟到海裡⁵。

強割本身即是脅迫，若根源是罪惡的，怎麼可能出現善意的結果？況且，臺灣現代化亦非從日據時代才開始，當「天津條約」迫使臺灣開港通商後，商業的繁榮，使得臺北自 1870 年代起就已呈現了國際商業都市的雛形，此時距 1895 年日本佔領臺灣尚早 25 年。

日本強割臺灣時，臺灣實際上已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進步之一省，其後日本就在已具規模的基礎上再行血腥高壓統治，發展以日人利益為主的全面現代化進程。因此才有余清芳、簡大獅、林少貓等人的激烈抗日行為，在日本統治下，渠等皆被視為「流寇」、「土匪」之亂。

自 1895 年日本竊據臺灣後，臺灣成了日本的屬土，可是島上人民當生活困苦，為了生存或躲避日人的迫害，便紛紛逃往大陸。因為大陸是祖國所在，它叫作「中國」。即使 1932 年日本在滿洲建立了「偽滿洲國」，大批臺灣精英也去了那兒。因為「偽滿洲國」在大陸，可逃避日本在臺灣的嚴密控制，極方便的進入中國—祖國的懷抱。⁶

所以中、日戰爭時，臺灣島上的人民，在兩國之間的每一個作為，都會對雙方產生重大意義與影響。「身在曹營心在漢」，於是臺灣有能力在日本境內走動者的社會精英，幾乎都成了中國的第五縱隊。對日本的一分不滿、抗爭即是對日本傷害，而成為對中國的一分貢獻。所以，為了釐清這個國與國之間的人心歸屬、行動作用等問題，就必須從形成國家意志的最高層級「國家戰略」的角度，來加以判別和認定。

何謂「國家戰略」？依據《國軍統帥綱領》的解釋：「為建立國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俾在爭取國家目的時能獲得最大成功之公算與有利效果。」『國家戰略』尚包括政

²戴國輝，《臺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臺北：南天書局 1999 年 11 月）。

³戴國輝，《臺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5 年 3 月）。

⁴許介鱗，《臺灣史記》，卷一到卷四，（臺北：文英堂，2001）。

⁵福澤諭吉，《時事新報》，1896 年 7 月 29 日社論，《臺灣風物》42 卷 1 期，頁 131-132。

⁶參見黃光國，〈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聯合報副刊，民國 107 年 3 月 11 日至 13 日。

治戰略、經濟戰略、心理戰略及軍事戰略，亦即建立與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心理、軍事諸國力因素，以獲致國家目標。」⁷因此，本文試從「國家戰略」的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個因素，探討臺灣同胞在抗日戰爭中的具體貢獻。易言之，本文旨在探討臺灣同胞於抗戰期間，毀家抒難，不計安危的英勇表現及其具體作為。

參、政治層面

一、臺、日政治浮動

(一)臺灣潛行

要瞭解抗戰期間臺灣的政治變局，必須先從當年最具代表的林獻堂開始。林獻堂先祖為福建閩南人，遷居臺灣後幾經胼手胝足，辛勤耕耘，歷數代家業興旺成為望族。1881年林獻堂生於臺中霧峰，原名大椿，號灌園。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4歲那年滿清甲午戰敗割臺，日本軍國的血腥殘殺，在他年輕的心頭烙下了難以泯滅的傷痕，遂生抗日心志。

1907年，26歲的林獻堂在日本留學，結識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1911年2月，梁啟超應邀來臺，暫住林獻堂萊園五桂樓時，曾寫下《萊園雜詠》10首，以示心跡。訪臺期間，梁啟超在林獻堂、連橫等人陪同下至臺灣各地參觀，並專門拜訪了鄭成功的「明延平郡王祠」。

1920年，林獻堂結合留日臺灣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自任會長，並仿北京《新青年》，創辦中文月刊《臺灣青年》雜誌，從此，臺灣人有了屬於自己的政論雜誌。

「新民會」的宗旨在謀求臺灣的自治，但林獻堂考慮日本政府的強烈反應，恐招致殘酷的鎮壓，而改向爭取臺灣人的參政權上，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臺灣人和日本人相同的平等權利。其首要之舉，即在去除惡法「六三法」。

所謂「六三法」，乃是指1896年初由伊藤博文內閣制定的「臺灣法案」⁸。該法案實際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於統治臺灣的基本態度。它是以假法律之名，行總督制之實，集軍政、行政、司法、立法等大權於一身的獨裁統治。該法案原定期限為3年，可是直到1919年仍未取消。而「六三法」的存而不廢，使林獻堂認識到與其去除臺灣的獨裁統治，不如趁此機會要求設置臺灣的代議機構——臺灣議會。

1921年1月30日，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等在東京召集了177名臺胞簽名，⁹向日本第44次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要求設立一個由臺灣民眾選出的議員，組成的臺灣議會。臺灣人士從日本認為「不法」的武裝反抗轉變為「合法」爭權運動，在日本憲法規定的民權原則下，臺灣是日本領地，在臺灣的人却没有參政權，明顯是違憲行為。雖然日本帝國議會「拒不受理」林獻堂等人的請願書，但請願運動仍在日本政壇掀起了巨大的波動。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被迫請議會把「六三法」作了部分修正，稍晚，日本政府頒佈了所謂《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由總督任命特聘20位臺灣人為評議員，對總督的政務進行象徵性的監督評議。

林獻堂等9名新民會人員接到「評議員」聘書後，開始以此有利條件更加積極領導和參與爭權運動，對日本統治進行了日本許可的「合法抵抗」。

1921年10月17日，林獻堂又進一步與蔣渭水和蔡培火等人士，在臺北大稻埕成立「臺灣文化協會」，¹⁰組成人員有學生、地主、仕紳、農民、公務員、律師、醫生，其中以年輕

⁷國軍統帥綱領修編小組，《國軍統帥綱領》，（臺北：國防部，民國74年），頁15。

⁸為日本明治29(1896)年6月3日，日本第十屆帝國議會通過的第63號法案公佈，故稱作「六三法」。

⁹戴月芳，《蔣渭水VS.林憲堂——兩位臺灣民族運動先驅》，（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2月），頁175-178。

¹⁰同上，頁122。

學生為主體，創立之初有 1032 名會員，最多達 1314 人。¹¹「文協」成立後，發行會報、出版文化叢書，遍設讀報所，舉辦講座講演會，甚至組織劇團到各地巡迴演出，傳遞中華文化，廣播來自祖國的資訊，抗拒日本的統治。

1922 年 2 月，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再徵得 512 名臺灣同胞的同意簽名，又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但仍未被議會「採納」，於是採取更積極而深邃的文化行動；同年 4 月，《臺灣青年》更名為《臺灣》雜誌。次年初，《臺灣》雜誌社在臺南成立「白話文研究會」，展開傳播白話文的工作。同時，在東京的《臺灣》雜誌亦改為《臺灣民報》半月刊。《臺灣民報》首先打出了「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氣」的宗旨，大力宣導和普及白話文，所發表文章全部都採用白話文書寫。¹²

白話文的提倡和實踐，揭開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啟蒙。而《臺灣民報》從創刊號開始，就刊登了大陸的新文學作品，接著發表在上海的臺灣人許乃昌的長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將來》，廣泛介紹大陸的新文學運動。

5 月間，林獻堂等人在各地演講第二次請願經過，使日本當局十分惱怒，林獻堂的總督府「評議員」一職亦遭撤除，並遭到嚴密的監視。在日本的重重壓力下，林獻堂不得不宣佈退出了議會設置運動。

1924 年 9 月，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的臺灣青年張我軍，¹³在《臺灣民報》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排斥舊體詩和八股文，以「團結、毅力、犧牲」為武器，改造臺灣的舊道德、舊文化與舊制度。是年底，《臺灣民報》又發表了張我軍的《糟糕的臺灣文學界》，猛烈抨擊的臺灣文學界，並介紹陳獨秀與胡適文學革命理論和新文學作品，呼喚「文學革命」之情，溢於言表。

《臺灣民報》發表的文章，強烈激蕩著臺灣文壇，而引起了新舊文學的論戰。這場論戰推動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深入開展，並在論戰聲中出現了兩份中文白話文學雜誌——《人人》和《七音聯彈》¹⁴。這兩份雜誌的創辦，改變了《臺灣民報》孤軍奮戰的局面。

1927 年 10 月，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再行組建臺灣民眾黨，提出三大綱領：一、確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三、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¹⁵

在 1920 年後半，臺灣社會運動也隨之急速發展。於是有了 1928 年「臺灣共產黨」的成立。到 1931 年 2 月，「臺灣民眾黨」遭到取締；3 月，「臺灣共產黨」遭到破獲；6 月，赤色大檢舉，風聲鶴唳，唯僅存「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至 1936 年，林獻堂爆發「祖國事件」，¹⁶自治聯盟亦無疾而終。1937 年「七七事變」後，臺灣進入戰爭體制。於是，《臺灣新民報》等中文報刊或中文欄目均遭停刊，中文教學亦被迫停止。在高壓政策下，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及臺共等組織，並沒有放棄，而改以隱伏的方式持續進行抗日行動。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臺灣同胞回歸祖國的民心，瀰漫著整個臺灣社會。日本特高警察，從 1941 年 11 月至 1945 年 4 月，大肆搜捕可疑份子，據統計遭到起訴者，就有 200 多人，其中涉案人員，包括議員、律師、醫生、地方仕紳、甚至販夫走卒，震撼全臺各地及日本本地。¹⁷

(二)大陸的臺灣組織與志士

¹¹同上，頁 241。

¹²是時，臺灣士紳的抗日行動，由武裝反抗轉變為議會鬥爭，其過程曲折，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乃得自梁啟超先生的建議。參見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2015 年 9 月），頁 229-236。

¹³徐康。《臺灣抗日人物集之三》。（臺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9 月），頁 21-28。

¹⁴楊雲萍和江夢筆合辦的《人人》，1925 年 3 月。張紹賢創辦的《七音聯彈》，1925 年 10 月兩份雜誌。

¹⁵同註 7，頁 56。

¹⁶同上，頁 215。

¹⁷寺奧德三郎，《臺灣特高警察物語》，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0 年 4 月，頁 70-112。

臺灣志士不堪在日本表面依法統治，¹⁸實為特務、警察肆意捉捕高壓下生活，於是透過各種管道奔赴大陸，或中國國民黨、或共產黨，參加祖國抗戰，1940年在重慶的臺籍志士人數漸多，約有100人。

為了發揮臺灣志士的力量，1940年3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奉令成立了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該黨部屬秘密機構，主要在香港、廣東、福建等地從事抗日地下工作。

後又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組織、整合下，於1941年2月9日，有「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臺灣青年革命黨」、「臺灣國民革命黨」、「臺灣革命黨」等組織代表齊聚重慶，李友邦、李萬居、劉啟光、張邦傑、李友欽等解散「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及所屬各團體，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為大陸最大的臺灣同胞抗日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總會」在重慶成立，進行淪陷區及臺灣島內的組織發展，推進抗日運動。¹⁹

1942年3月，「臺灣革命同盟會」擴大組織並召開臨時代會，宣示：「本會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以集中一切臺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臺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為宗旨。」他們力求思想統一、行動統一及組織統一，放棄臺灣獨立主張，以收復臺灣、實行三民主義為共同目標。

二、外交

雖然，弱國無外交，但當時的黃朝琴、林頂立等人，仍能使中國在國際間發揮不少的強勢作為。略舉數端，分述如次。

(一)封鎖日本

1897年，黃朝琴生於日據臺灣的嘉義鹽水港，1914年他自鹽水港公學校畢業之後，升學就讀彰化公學實業科，但要升二年級時返家繼承父業而輟學。但他自覺學識不足，又看見日本人欺負臺灣人，遂決定去東京求學。

1917年，到了日本東京半年後，考入日本中學校。1920年，就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之後黃朝琴前往美國留學於伊利諾大學，獲該校碩士後即赴大陸參加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1938年為駐舊金山總領事，任內處理了「廣源輪案」。

抗戰全面開始時，廣源輪為淪陷區一家船公司，在舊金山購買的二手船，船長及高級船員都是日人，但水手全是華人，申請中國籍證書。黃總領事經查證此輪的背景可疑，尤其船上有廢鐵2000多噸準備運往日本，以供製作軍火侵略中國，故而起先拒不發證，後船東擬撤回申請，黃總領事乃發證，但又暫不交付，使船仍無法離港。船東訴諸舊金山法院，黃總領事乃以該輪已屬中華民國籍，而中華民國已進入戰時，呈准政府徵用該輪為公船舶，既為公船則美國法院無權管轄。

美國此時雖尚未參戰，但普遍同情中國的對日抗戰，黃總領事掌握了美國的基本立場而論述，終為法院接受。於是船東方面雖幾度申訴，全告失敗；船上的廢鐵，亦奉法院令不准移動。黃總領事又恐該輪私逃，於案件高潮時組織僑胞24小時監視。船東束手無策，最後只有放棄一切，於是黃總領事呈准政府將該輪拍賣，得款匯回國內。

後黃朝琴為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及駐甘肅蘭州外交特派員。抗戰最艱困時期，大陸沿海均遭日本封鎖，加爾各答又是國門外的第一大站，來往訪賓商旅多、待運軍品物資多、國內外派駐單位多、海員僑胞多、須照料協助的遠征軍官兵更多，可見此職務的重要性。

稍後，黃朝琴又奉派出任駐蘭州外交特派員，此時正是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於1944年6月經過蘭州訪問重慶之後，西北也成為盟國助我抗戰物資的重要孔道，黃氏適時發揮其外交長才，為政府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¹⁸依法理：法，臺灣人沒參與制定，也沒有不同意得權力，所以不能視為法，只是日本把統治臺灣人規定、要求，明白公布，臺灣人必須照作，不作就打、關、殺。這怎麼是法？

¹⁹許雪姬。《柯台山先生訪問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口述歷史叢書63，1997年6月），頁40。

「廣源輪案」可說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場別具意義的勝仗，它包括了外交交涉、法庭攻防、國際法的運用、僑務的組織等，各細節仍可作今天外交實務的範例。中國海岸線即使已遭到日本封鎖，黃朝琴仍去徵用該輪，在美國反封鎖了日本。²⁰

(二)中、美情報合作

林頂立為臺灣人，而林一平、林介之助、「十一龍頭」、「金門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場合使用的名字或代號。他公開身份是日本在臺灣警視廳特高課的高級特務，擁有日本國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的真實身份，則是軍統局在日本特高課中最出色、最隱蔽的情報人員。

講的一口流利日語的林頂立，從少年時期就被日本在臺灣的「黑龍會」組織吸收，不久轉入警視廳工作。林頂立以精通各種情報手段，做事機警敏捷，熟悉華人情況而不斷得到賞識和重用，1931年便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

林頂立將日本陸、海軍在東南沿海的佈防情報準確傳送給軍統局，軍統單位也充分利用從林頂立獲取的東南軍事情報。當國軍和美軍共同組建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時，為了獲得美方信任，軍統戴笠陪同美情報負責人海軍中校梅樂斯親自到東南敵後，車隊穿越日軍整個防線直到海邊，如入無人之境；使梅樂斯大為驚嘆，也對軍統局的情報能力產生了極大的信任，促成日後良好合作及美情報單位的全力支援抗戰。²¹

肆、經濟層面

一、抗日經濟戰

抗戰時期，軍統局奉命對日實施經濟作戰，於是在局內成立經濟處，由留日經濟學家鄧葆光擔任實際工作。

鄧氏分析日本佔領中國華東、華北地區，其目的在進行經濟掠奪。因此，製造大量偽鈔，和敵人爭奪物資，就成為有效的經濟戰手段。當時，銀行家貝祖貽為軍統局在上海的佈間——此人利用職務，定期收集日佔領區的各類鈔票交給軍統局之後，即在重慶大量仿造，而後通過安徽界首武裝運入日本佔領區，瘋狂搶購各種物資，並用來賄賂拉攏偽軍將領。這一作為給予日佔領區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壓力，物資大量流失，物價飛漲。

因此，日本在特高課成立專門機構，實施反經濟作戰，以不斷更改鈔票，及增加檢查手法，意圖恢復對佔領區的經濟控制。這樣，軍統局的假鈔經常被查獲外，偽軍將領使用假鈔，也很容易暴露和軍統的關聯。

日特高課每發現新的假鈔，或者每策劃一種新的檢查手法，林頂立都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情報，提前通知軍統方面，軍統局立即進行應變。這套經濟作戰貫穿了整個抗戰期間，不但破壞了日佔領區的經濟穩定，為我抗戰獲得了大量急需物資，同時也支撐了日益重要的軍統情報作戰。

二、臺灣義勇隊的醫、技措施²²

(一)設立醫院

臺灣義勇隊成立初期的60多位隊員中，有半數以上懂得醫學。因此，臺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一直把醫療作為主要工作之一。最初，臺灣義勇隊在金華設立醫療所，義務醫治傷病兵與百姓；不久，又在金華市外的6個鄉設立醫療所，同時組織4個巡迴醫療隊，每隊5個人，每天到鄉間去巡迴一次，方便廣大農村病人就地治病。巡迴醫療隊到了人口比較集中的村鎮，並應當地人民要求，把巡迴醫療隊改為醫療站。如1940年3月在義烏縣義亭，就設立了臺義

²⁰ 沈呂巡，《從辜寬敏想到黃朝琴》，中時電子報，2017/1/14。

²¹ 薩蘇，《尊嚴不是無代價的》，（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2月）。

²² 樓子芳，《抗日烽火中的臺灣義勇隊》，（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2003年7月），頁44。

隊義亭醫療站。它實際已是一個小醫院。²³

抗戰期間，由於後方城鎮人口不斷增多，原有醫療機構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臺灣義勇隊為補救此一缺憾，也先後成立了4所臺灣醫院，並擴大規模和增加設備，在金華（第一）、衢州（第二）、蘭溪（第三），成立了3個附設臺灣醫院，後來又在福建設立第四所臺灣醫院。

（二）生產重要物資：

抗戰時期，無論是前方或後方，軍用和民用物資都嚴重缺乏，為了協助當地政府恢復和發展生產，臺灣義勇隊中凡「具有國防生產技術者」，或「曾經在日本兵工廠裏，學過一段時期的技術人員，會製造機器，製造各種軍需材料。」²⁴此外，臺灣義勇隊也派遣隊員協助籌設樟腦製造廠和藥品生產。

1、樟腦油

具有生產樟腦油技術的隊員，分別協助閩、浙兩省建設廳，籌設樟腦製造廠，生產軍火原料的樟腦，作為動力用的樟腦油。臺灣義勇隊在福建，在崇安設立樟腦製造廠；1939年8月，在浙江麗水協助浙江省建設廳，興辦樟腦生產試驗場。當時在毫無設備的條件下就地取材，克服種種困難製造樟腦油，以補強煤油、柴油之不足。

2、藥品

在藥品生產方面，由隊員協助當地政府創辦「金華縣東關鄉藥品生產合作社」。該社生產的主要藥品有：麻拉利亞藥水、皮膚膏、健胃散、瘧疾丸等，而且多數是直接送往前方部隊去供給應用。²⁵

伍、心理層面

一、日本的宣傳作為及臺灣同胞的反應

（一）不實宣傳

抗戰期間，臺灣同胞要瞭解戰情的來源，主要靠收音機，收音機是臺灣民眾最仰賴的訊息來源。「富有的人自家擁有收音機，窮苦的人則從公眾的廣播塔聽消息」，據臺灣史專家林衡道表示，這類的「放送塔」，如今臺北新公園還保留一座。²⁶除收音機外，日本政府的主要宣傳管道，為日人編輯的「臺灣日日新報」，這也是傳達日本政令的主要媒體。

「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三天，「臺灣日日新報」便以四頁篇幅全版報導有關東北戰情。其大小標題所反映的重點，無非是「戰爭，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實因中國人的節節進逼，事後，日本軍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擴大，為維持威信，才『嚴懲』敵人。」從日本政府刻意傳達的訊息中，無非是為中日戰爭的日軍「師出有名」的侵略行動，來取得正當性。

「說穿了全是謊話」，林衡道回憶時說道，當時臺灣同胞接收到的訊息是：「中國貧窮落後，日本係為了拯救中國、保衛東亞的和平而戰。而東亞一方面有英美勢力插足，一方面蘇俄從北邊到中國大陸，若無日本出面，就沒有別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國，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說：「『代天打不義』，當時教唱的軍歌如是說。」吳濁流著的《臺灣連翹》指出：²⁷「九一八」時，臺灣非常不景氣，「失業的人到處都是，臺灣青年只求出國，無論好壞，總想從臺灣跳出去。」

然而臺灣人接受戰爭訊息的來源，還有非日本官方的宣傳管道，被稱為「代表四百萬臺灣人言論立場」的中文「臺灣新民報」。該報在1930年盛況一時，發刊五、六萬份，讀者群

²³陳正平，《李友邦與臺灣同胞抗日》，（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2000年8月），頁204。

²⁴李友邦，〈我們的工作〉，《臺灣先鋒》第一期，（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5月），頁5-6。

²⁵李友邦，〈我們的工作〉，《臺灣先鋒》第一期，（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年5月），頁6。

²⁶現在新公園已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²⁷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草根出版社，1995年）。

是少數的臺灣菁英。事變期間的新聞標題如：「滿洲遍地起風雲，日本軍佔領奉天」、「張氏通電宣導和平，國家命脈一線僅存、披髮纓冠拒容忽視」等，明顯可看出其「心向祖國」的民族主義立場。在日本高壓的統治下，「臺灣新民報」的「甘冒大不諱」的作法，反映出臺灣精英的心態。

隨著美、英與日本關係的緊張，日本、臺灣媒體就由軍方管轄，煽情與亢奮成了報導的主流，「臺灣日日新報」便成了軍方最得力的宣傳幫手。除仰賴軍方掌控的媒體外，還包括當時已具規模的民間動員系統，如鄉里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員等。²⁸這些政令宣導員家中，除日文報紙、收音機外，也會有一些宣傳單、小冊等宣傳品。如《皇民時局教典》的宣傳小本，即是有關戰爭問題「答客問」的宣傳小冊。

當時臺灣的知識精英，對日本發動的這場「與祖國間的戰爭」，是相當不認同的。當時任「臺灣新民報」編輯的葉榮鐘在他的回憶文中寫道：「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他說，有時這種窩囊真要把人活活氣死。然而，「臺灣新民報」畢竟是臺灣精英很依賴的一份報紙，「要看戰情，去圖書館看日日新報；要紓解苦悶，看臺灣新民報」。日據時代新文學健將王昶雄更指出，²⁹新民報能真正反映「臺灣人的心情」。

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朝日、每日新聞等媒體製作了一系列，有關發生在1937年的淞滬戰役、南京淪陷的宣傳片。日方的宣傳片，僅以「戰火蔓延至上海，我軍奮戰」、「壯烈成仁的我軍海軍航空部隊」，兩個畫面草草帶過。而對於日方攻佔南京時，屠殺中國三十萬人民的暴行，宣傳片一個畫面也沒有；僅以「指揮官勸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著是「南京光華門上日軍軍旗飄揚」，來凸顯日軍佔領南京城的勝利。

面對日本的種種不實宣傳，臺灣同胞自有其因應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時他們將日日新報的「戰情」「倒著看」，朝相反的方向去理解，倒也能猜個大半對。當時臺灣人懷疑日本宣傳動輒形容的英勇戰績，葉榮鐘的回憶也提到，當時電臺每天播放大陸的戰況，重要的戰果均以「大本營發表」為號召，先用軍樂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報。

蘆溝橋事變之後，戰火燒到上海，跟隨著戰事吃緊，臺灣人民也開始被動員徵調入伍。《臺灣連翹》中寫道：「有些戰士在光榮聲中入伍，隨即重傷或死亡的消息傳來，臺灣人才發現，向來藐視中國軍隊說『支那兵！支那兵』，事實上好像不是那麼不堪一擊！」。

1937年，日本為了強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島報紙一律廢止中文；1941年，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前，「臺灣新民報」也被改名為「興南新聞」，當時「一切均在軍事掌控之下，談不到自由，更沒什麼民族思想可言」，楊肇嘉的回憶錄指出，臺灣人的喉嚨，至此逐漸「失聲」。

但此舉反使得日本人無法掌握臺灣人的心思，而出現心理不著邊際的恐懼；相對地，臺灣人的心理反更加明白，日本將要戰敗，否則何須緊縮、何須造假，於是開始醞釀如何趁勢推翻日本統治。³⁰

(二)皇民化行動

日本佔據臺灣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期，總督府政策在於掠奪臺灣資源，教育目的只為普及日語。雖然就學率逐年提高，但很多的成年男女仍然不懂得日語。於是為了進一步擴張戰力，以及塑造效忠日本的「國民」，乃致力於在精神上動員臺灣人，使其成為「皇民」，皇民化遂成為重要的目標。

所謂的「皇民化」運動，要求除了普及日語，廣設國語講習所外，³¹在文化上嚴格取締中文，宗教信仰上，強化日本神道教信仰及破壞臺灣寺廟。在更改日式姓名方面，直到1943

²⁸即日據時代的鄉鎮公所辦事員。

²⁹王榮生，筆名王昶雄，是一位生於臺灣淡水的牙醫及作家（1916～2000年）。

³⁰同14。

³¹所謂國語文，指的日文而非中文。

年底僅有 2% 的臺灣人遵行。據許多戰後臺灣人的回憶，當時一般人對於「皇民化」措施，只是消極應對，並表示「更改姓名」的原因，也只是預期對於子女就學，以及配給有較多優惠才作的，並非跟親日有直接的關聯。換言之，日本政府的認知跟臺灣人所接受、所想像的兩者之間，仍有著天壤之別。

日本人在臺灣實行「皇民化」，口頭上的宣傳和實際行為有著極大的反差，他們動輒鞭斥臺灣人，污蔑為「清國奴」。再加上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對臺灣經濟進行瘋狂的剝削和侵佔，在受教育的機會上也出現巨大的落差，這些都進一步增加了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的仇恨。

(三)徵兵

至於徵募過程和方法，依日本軍部的要求，由「臺灣總督府」訂定資格和條件進行選拔，並分配一定名額給地方各州廳，由地方州廳官員廣為宣傳招募人員。若人數不能滿額，日本警察和憲兵就調查年滿 20 歲的男性，按地址逐戶借「拜訪」、「鼓勵」名義施壓。在日人的高壓統治下，若不接受「拜訪」和「鼓勵」，日本警察將逕以「所謂有意者」名單進行審核，並發給通過查核者一張召集令，算是招募成為臺籍軍夫。在日本「皇民化運動」的鼓煽下，有不少臺灣青壯年因受到現實生活上的威逼利誘，而不得不加入日軍。

即使對一般的臺籍日本軍夫，日本軍方也從未消除猜疑。1943 年底，美日於塔拉瓦環礁的兩棲攻防戰。日本海軍工程建設隊的臺籍軍夫，他們以「奉公團」、「義勇團」名義，開赴新幾內亞拉布爾日軍基地，在塔拉瓦環礁服勞務構築防禦工事。守備日軍不發給他們武器，更不准他們進入陣地掩蔽，兩千名臺籍軍夫慘遭美國艦炮岸轟得血肉橫飛。³²

至於臺籍日本軍人的處境也一樣。³³據屏東客家的邱錦春敘述：他考上日本陸軍軍官後補生，在經過九個月訓練後，於 1943 年前往名古屋地區的陸軍第七航空部隊報到，擔任日軍轟炸機的副駕駛。

他一到部隊報到後，隊長特別下令不准其他日本人歧視他。雖然日軍一再強調對他這個臺灣出身的皇軍不會有差別待遇，但是自美軍攻克琉球後，在派他執行一趟運送武器到臺灣的秘密任務中，卻顯示了日軍的戒懼心態。邱錦春說：「當時我從名古屋飛到漢城，漢城飛到上海，上海再飛到桃園。隊長他們三個人飛了八個鐘頭，先去休息要我監督加油。加完油後一出機場，前面一個憲兵，後面一個憲兵。當他向隊長提出質疑時，隊長告訴他加派憲兵是為了要保護他，怕殺手潛伏到臺灣來刺殺他。」

日本政府對臺灣人民一直有所顧忌，並擔心臺籍日本兵在中國戰場上倒戈。日本陸軍省軍務局官員直截了當地說：「（特別志願兵制）避免對臺灣民眾使用，是因為現在正處在與其舊祖國——中國事變之下。」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臺灣人民祖國意識的戒慎，於是最後把他們送到南洋。

二、臺灣同胞在大陸的應對作為

(一)奮力論著，導引思想抗敵行動

宋斐如，原名文瑞，字斐如，生於 1902 年，臺灣臺南縣仁德鄉人。1922 年 3 月，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隔年 9 月赴大陸，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在校期間與張我軍、洪炎秋等臺灣青年學生創辦《少年臺灣》月刊，並任該月刊後期主編，向臺灣人民介紹、宣傳祖國實況。

1930 年 1 月，宋斐如與劉思慕、呂振羽、夏次叔等人成立「東方問題研究會」，創辦並主編會刊《新東方》月刊，研究東方問題。其宗旨為「團結融合東方各個被壓迫民族，以共籌解決整個東方問題的方略。」1930 年 9 月，畢業留校任教。

1930 年至 1932 年間，先後發表〈「德化政策」下的臺番暴動〉、〈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等 20 多篇文章及近 10 篇譯文，

³²鍾堅，《南十字星下的臺籍孤魂》，聯合報，2015-09-03。

³³上面軍夫都不相信，正式軍人更不能。

以大量的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我東北及臺灣，企圖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滔天罪行。

1935年至1937年，宋斐如前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潛心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及外交政策。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重返大陸。1938年1月，在漢口發起組織「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擔任總幹事，研究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並創辦《戰時日本》期刊，擔任主編。嗣後，該刊物先後轉移至廣州、桂林、昆明、重慶等地，自1938年8月1日創刊至1942年1月15日終刊，歷時3年半，共出版了6卷32期。

抗戰期間，宋斐如出版的專著有《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九國公約會議與我們應有的鬥爭》、《日本鐵蹄下的東北》、《日本戰時外交內幕》、《日本亞洲獨霸戰》等16本；譯著共有《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太平洋戰略論》等8本，可謂著作等身，為人稱頌。

1943年8月，宋斐如任《廣西日報》主筆；此期間，他又在《廣西日報》、《大公報》、《西南青年》等刊物，發表了〈毋忘臺灣〉、〈論臺灣的革命戰略〉、〈如何收復失地臺灣—血濃於水臺灣必須收復〉等30多篇有關抗戰及收復臺灣的論文，令人驚艷。

(二)「滿映」的臺灣人

蘆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本為了美化侵略中國行動，於一個月後成立「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外界簡稱為「滿映」。它屬於「偽滿洲國」政府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合資成立的電影公司，也是當年亞洲規模最大的電影製片廠。滿映製作的電影，有一個特色，就是清一色用中國演員，去演對日本效忠的故事。

張天賜，這位臺灣導演在偽滿洲國很快的發跡，「滿映」日人看見了他的才華，就送他到京都的電影研究院深造，他跟隨著一些當時日本著名的導演工作學習，不只是張天賜，還來自臺中大甲的柯鴻礎，臺中一中畢業後，同樣來到東北學電影。但臺灣導演再怎麼優秀，也不能涉獵敏感的戰爭宣傳題材，尤其1940年戰事吃緊後，被日本統治的臺灣人，最多只能拍娛樂片。張天賜遂以中國歷史上一些民間傳說，或者是古典名著當中的故事拍成了電影。一方面他擁有很多的觀眾，拍攝出來的影片也比較精彩，日本人的審查制度也不會干涉，這樣一來他也樂的不用去做一些宣傳日本跟日軍的影片。

(三)除漢奸震撼敵心、振奮民心

劉戈青，臺灣雲林縣人，生於福建廈門，1935年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他邀約了八位同學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正準備在福建開發礦業時，被軍統局的戴笠發掘，連同他和八個同學一同參加了軍統。在杭州警校接受情報工作訓練，後分發到軍統上海區，擔任行動組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劉戈青擔任少校隊長在大場附近負責戰場偵察和防範漢奸活動。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年已六旬的陳籙賦閑在家，但在上海、南京淪陷後，陳籙靜極思動，乃與漢奸梁鴻志、溫宗堯等人籌組偽維新政府。陳籙，福建閩侯人，歷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長，代總長等要職。

1938年，梁鴻志在南京正式成立偽維新政府，陳籙出任偽外交部長，他憑藉任職時的關係，斡旋於偽維新政府和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間，極力破壞抗戰。因此，軍統局上海站行動組劉戈青等採取制裁漢奸陳籙的行動。

1939年2月初，劉戈青與朱山猿、平福昌、譚寶義等人奉命暗殺了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長大漢奸陳籙。劉戈青率人暗殺陳籙之舉，令日偽當局相當震驚。同年2月20日，上海各報競相刊載特大新聞：「鐵血軍破門而入，偽外長即登鬼門」。

(四)臺灣義勇隊的宣傳深入人心

臺灣義勇隊在抗戰時期的宣傳行動大致包含口與筆兩類，口誅筆伐，深入人心，其所激發的戰鬥力實不容小覷。

1、口的宣傳方面

(1)政治性

透過演講、記者招待會及各類紀念會等種種管道，以激勵臺胞和全國軍民的鬥志；宣傳臺灣抗日的歷史和臺灣抗日的任務。

(2)藝文性

運用歌唱、話劇等方式，擴大宣傳效果。在歌唱方面，經常舉辦歌詠會，除演唱抗日歌曲外，亦唱大眾愛聽的歌曲；在話劇方面，則與朝鮮義勇隊組織韓臺劇團，參加各地舉行的紀念會、招待會表演活動。

(3)戰鬥性

組織戰地工作隊，深入前線，和抗日部隊一起生活和戰鬥，激勵官兵奮勇殺敵意志。

2、在筆的宣傳方面

(1)政治性

金華出版的《臺灣先鋒》及《臺灣革命叢書》，皆屬具代表性的抗戰書刊。《臺灣先鋒》由李友邦主編，共出版 10 期。與金華各刊物聯合出版《抗戰建國三週年聯合特刊》和《元旦特刊》各一期。於後期創辦的《臺灣青年報》，曾於 1944 年在貴陽舉辦的「全國報紙雜誌圖表照片展覽」中參加展出。

此外，臺灣義勇隊每週還出版一張〈臺灣壁報〉，少年團出版小型雜誌《台星》。李友邦和隊員又多次在其他報刊發表文章，如浙江的《東南日報》、《東南戰線》、《浙江潮》、《浙江婦女》、《東南兒童》，福建的《福建民報》、《福建導報》，廣西的《救亡日報》、《朝鮮義勇隊通訊》，江西的《前線日報》等，十分活躍，而令人矚目。

(2)戰鬥性

潛入敵佔領區，散發日文傳單、標語。

陸、軍事層面

抗戰期間，臺灣同胞、學生³⁴請纓回到大陸參加作戰的事例，不勝枚舉，受限篇幅僅列舉若干具有代表性者。

一、陸軍方面：茲分國軍、共軍兩部說明

(一)國軍部分

1、鄒洪

鄒洪生於 1897 年，長兄鄒薌谿長於鄒洪九歲，於清末留學日本大阪工業專門學校。1913 年乘完成學業返臺之際，帶著鄒洪回到上海。鄒薌谿其後歷任大學教授，江西省崇仁縣縣長。鄒洪則入江蘇省第 5 中學就讀，1919 年考進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同期同學包括陳誠、周至柔、羅卓英等名將。

鄒洪自排、連長基層任職，1924 年出任第 4 師參謀。1928 年，山東濟南爆發「五三慘案」，鄒洪身歷其境，感觸特別激烈。北伐期間，鄒洪參與了長衡、南潯、武漢、郢城、臨潁等諸戰役。依次擢升為團附、營長、團長、參謀長。1929 年 11 月討桂戰爭時期，調升第 11 師少將參謀長，年僅 33 歲，後鄒洪又因戰功升為第 43 師中將師長。

1936 年，鄒洪調任粵漢鐵路警備司令，再任廣東省保安處長，兼任廣東省學校集訓總隊長，學生一律接受軍訓教育，以積極培養青年對軍事的基本認識。1938 年廣州失陷前夕，鄒洪率大專學生 5000 餘名轉進為國儲才，蔣委員長極表欣慰，特頒「堅苦卓絕」獎辭獎勉。

1939 年，鄒洪編組第 2 軍於北江、英德、翁源等地抵禦日軍，又在蘆苞、四邑之役大挫日軍。1941 年 9 月底，日軍阿南惟畿第 11 軍想要打通粵漢鐵路之南北走廊，急攻長沙，鄒洪奉薛岳上將令馳援友軍，與日軍大戰於株州，擊潰日軍，即第二次長沙大捷。大捷後，鄒洪奉命留備，兼任長沙警備司令，料敵必然再犯長沙，積極籌備防禦工事，不到一個月即完

³⁴許雪姬，《柯台山先生訪問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口述歷史叢書 63，1997 年 6 月），頁 33。

成守備工事。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果然又進犯長沙，國軍大破日軍，是為第三次長沙大捷，而此次大捷致勝的關鍵之一在於擁有堅強的工事。

第三次長沙大捷之後，蔣委員長親臨衡山召開軍事會議，嘉勉有功將領。以鄒洪指揮若定、戰功彪炳，擢升為第35集團軍副總司令、頒四等雲麾勳章。1945年，鄒洪再出任粵桂邊區總指揮，不幸積勞成疾於49歲英年逝世，死後追贈為陸軍上將，為國軍第一位臺籍上將。

2、黃國書

黃國書生於1907年，20歲時便偷渡返回大陸，輾轉以中國留學生身份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19期炮兵科學習，並以第一名畢業，獲「軍刀獎」。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黃國書回到大陸，在黃埔軍校軍官團和炮兵學校等處任職。

1934年，黃國書被派往德國炮兵學校深造，在校期間，他努力鑽研機械化炮兵戰術。由於炮兵戰術的造詣出眾，於畢業時希特勒親自贈與德式軍刀一把。

回國不久，全面抗戰爆發，黃國書被任命為砲兵第9團上校團長，指揮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砲兵部隊與日軍作戰，讓日軍精銳板垣師團領教到了中國砲兵的威力，黃國書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砲兵三傑之一」。

隨後，黃國書又相繼出任第5軍參謀長、混成旅旅長、新編第13師師長和新43師師長，在戍守黃河和豫西會戰中立有戰功。1945年春，日軍集中5個師團加上3個旅團的兵力向豫西和鄂北地區發動瘋狂進攻。4月5日，時任新43師師長的黃國書率部，在重陽店附近隘口阻擊，他下達給第一線的兩個團長命令即「與陣地共存亡」。日軍在一個晚上連續發動了七、八次衝鋒，仍未攻下新43師陣地，表現極為英勇。

3、李友邦

李友邦臺灣臺北蘆洲人，1904年生。1918年，14歲的李友邦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參加文化協會、策動學運等抗日活動。1924年李友邦與林木順、王添進等八位同學突擊臺北新起派出所，被學校開除學籍，通令逮捕。李友邦遂逃離臺灣，前往大陸，4月李友邦抵達廣州後，進入黃埔軍校。1939年2月22日在金華縣酒坊巷18號正式成立「臺灣義勇隊」與「少年團」，號召各地區的臺灣同胞，共同參加抗日的救亡運動。

1943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舉行國際會議，開羅會議後，臺灣義勇隊擴大編制為臺灣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中將總隊長，作戰範圍擴及前線、後方、敵後與淪陷區等四大領域。

4、陳嵐峰

陳嵐峰，臺灣宜蘭人，1904年生，原名岸浦，別號南光，1919年更名嵐峰，隻身赴上海，考入暨南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繼入暨南大學，後赴日本，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26年畢業歸國，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教官。1927年6月，調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參謀。1928年任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大隊長，嗣後在南京任軍官訓練團第一連連長。其後出任第4師參謀處處長及第49師之團長等職。1936年日軍侵入熱河、察哈爾等省，奉命北上，率軍前往內蒙百靈廟作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任第89師少將旅長。1938年夏，任豫鄂皖游擊總指揮部參謀長，後任新1師副師長，第一戰區第11游擊縱隊司令。1944年任新5師師長，該師於同年12月充編為第203師，抗戰勝利後任職國防部。

5、王民寧

王民寧原名長裕，字一鶴，臺灣省臺北縣樹林人。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因不滿日人統治，潛返大陸，就讀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投筆從戎，遠渡日本，入日本士官學校工兵科。返國後，於中央軍校任教導團排長、連長、營長等職。1932年，參加「一二八」淞滬戰役，後任工兵學校教官。1938年4月，調新編成的工5團少將團長，參加「長沙會戰」，1943年任工兵學校研究處處長兼教育處處長。

6、蘇紹文

蘇紹文字天行，本名炎坤，臺灣省新竹人。自新竹公學校及臺北商工學校畢業後，赴大

陸入北京大學預科，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炮工學校。返國後，歷任各項軍職，最後為陸軍特種兵聯合分校炮兵科少將科長。

7、陳漢平

陳漢平，臺灣高雄縣人，日本慶應大學畢業，日本士官學校肄業，回國後於中訓團黨政班，炮校戰術班受訓。1929 年任中央軍校少校教官，1930 年春，調南京鐵道炮隊中校隊長。1932 年，任第 61 師新兵訓練處主任，1933 年 2 月，任第 61 師獨立團團長。1934 年赴粵，任第 1 集團軍技術兵團上校團長，燕塘 4 分校教官。1939 年，任 4 分校第 16 期學生副總隊長。1941 年 6 月，任 4 分校炮兵科少將科長，1944 年冬，兼黔桂邊區防守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8、蘇薌雨

蘇薌雨名維霖，字以行，1902 年出生於新竹北門外沙崙。就讀新竹公學校，畢業後，於 1920 年秋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學期間，受五四運動之影響，積極鼓吹白話文，提倡新文學，經常在《臺灣民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1925 年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蘇氏與洪炎秋等人，以北大臺灣學生會名義約集臺灣同學舉行追悼會。

1935 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進修心理學，1937 夏，返回北京。蘆溝橋戰起，投筆從戎，擔任陸軍第 31 師師長池峰城顧問，親自參與臺兒莊之役。臺兒莊大捷後，奉命陪同勞軍團離魯南回漢口，在漢口進入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日本科任職。1939 年，由重慶遷至桂林，任職廣西省戰區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先後擔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兼國民中學教育訓練班主任導師。蘇氏亦為國立廣西大學教授，廣西省立醫學院訓導主任。

9、陳守山

陳守山生於臺灣臺北，少年時隨父母返回福建，就讀於南安市溪美鎮蓮塘村小學。後隨祖父經商去廈門同文高中就讀。迨抗戰軍興，以燒掉日本護照明志，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十六期步科，畢業即參加抗戰。抗戰期間，陳守山曾率部攻克南日島，於福清戰役中遭敵逆襲，負傷昏迷，幸由兩位部屬背負脫險。

10、林正亨

林正亨為臺灣霧峰林家後代，1915 年生於廈門市鼓浪嶼，在福州讀書，1937 年考入南京陸軍軍官學校，1939 年畢業，任 36 軍見習官。1940 年 1 月隨部隊赴廣西作戰，任 96 師參謀處少尉軍官，參加崑崙關戰役，晉升中尉連長。1944 年 7 月，參加遠征軍，任步兵團指揮部連長。在緬甸戰役中，以一敵八，擊斃了頑強的日軍身負 16 處重傷，昏迷後被戰友從死屍堆中拖了出來，背往野戰醫院救治，在後方的醫院住了一年。

除上述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熱血青年積極參與抗戰行動之外，尚有不少主動請纓，進入黃埔軍校，為國獻替。他們在抗日戰爭中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據文獻資料顯示，黃埔第三期有林文騰、黃濟英、陳紹馥；第四期有張克敏、蔡祝火、廖武郎、林夢飛；第六期有陳辰同、林樹勳、楊春錦、林萬振、羅崇光、溫而勵、陳旺樞、郭禦屏、李祝三、李中輝等人。

(二)共軍部分

1、張志忠

張志忠，本名張梗，化名老鍾，臺灣嘉義人，1910 年生，出身貧農。新港公學校畢業，於合隆商號工作，靠著新港鄉紳林維朝的資助偷渡大陸，就讀於福建私立集美學校，加入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與莊泗川共同主編《共鳴》雜誌。嗣後出任臺灣省無產青年會嘉義負責人，日本警察取締該會擴大之臺灣黑色青年聯盟時，張志忠被捕被判免訴。

1932 年 4 月，參與上海臺灣反帝同盟，7 月因盟員陳炳譽和董文霖被捕為日本政府循線逮捕。1933 年 6 月 29 日裝瘋獲假釋，經日本、大連、青島逃離臺灣。

張志忠於 1939 年春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軍士隊受訓，8 月結訓後直接進入戰場，至第 18 集團軍第 129 師劉伯承、鄧小平部，於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任幹事，1940 年後升任冀魯豫軍區冀南縱隊敵工部日軍工作科科长。

2、蔡蕭

蔡蕭出身臺灣臺南貧家子弟，在1930年回到大陸，在廈門當學徒。抗戰全面爆發後，蔡蕭參加閩西南抗日游擊隊，後來進入新四軍。

3、沈扶

沈扶，1913年生於臺灣臺北市淡水，為了不受日人的奴化教育，1930年6月，舉家離臺，歸返大陸。1937年11月11日，日軍佔領上海市，沈扶搭乘英輪到香港。

1938年7月，前往廣州八路軍辦事處辦理手續，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於7月底抵達延安，隨即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1939年起，調到第18集團軍總政治部的對日工作部門，管教日本戰俘，並研究和翻譯對日資料。

4、董克

董克生於臺灣臺南市一個商人家庭。1930年夏，先到廈門雙十中學，再到集美學校。其後，前往菲律賓馬尼拉親戚開的商店工作。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僑領王雨亭先生指導下展開抗日行動。1938年5月，他和其他6位華僑青年，在王雨亭的安排下，登上開往香港的客輪，然後搭火車直達西安，再轉至延安。董克生於陝北公學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在冀魯豫地區從事宣傳工作

5、文英

文英本名陳定瀾，1924年生於臺灣臺中縣。1934年秋天，隨父親及家人到北平。1943年夏，就讀北京市立第三中學高中部期間，參加了由北師大男、女附中，男三中，河北高中等校學生組織的「海燕社」。1944年，考上北京大學政治系。1945年1月4日，到達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的阜平縣，加入抗戰工作

6、翁阿冬

翁阿冬，臺灣臺北人，臺灣共產黨黨員翁澤生之妹。1938年，經廖承志介紹，隻身經新加坡、香港，到延安參加抗日。為避免連累臺灣的親友，改名為馮志堅。

7、黃南鵬

黃南鵬，1899年生於臺灣彰化，原名黃維煜，1920年在日本參加抗日的東寧學會。抗戰後期，隸屬於汪精衛偽政權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並以中將身分擔任華北治安軍第2集團軍司令。1944年5月25日，改任北京憲兵司令的黃南鵬，透過當醫生的彰化同鄉曾明如的協助，結識了負責對華北治安軍進行統戰工作的共產黨冀南軍區情報處副處長賈建國，從而直接建立了與共產黨的地下聯繫管道。

透過黃南鵬的幫忙，由共產黨所建立的冀南軍區，不僅得到了包括槍枝、子彈、藥品與印刷機等軍事物資，同時還為派入北京活動的共產黨員，取得了來去自如的通行證。甚至，黃南鵬還會提前將華北政務委員會所擬定的抗日分子搜索名單交給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以確保他們能夠在北京憲兵隊與警察動手前提前脫身。至於已經被逮捕，並且被華北政務委員會宣判死刑的共產黨員，也往往會在黃南鵬的副官親自護送下，暗中回到八路軍根據地。

二、海軍方面

(一)李國堂³⁵

李國堂生於1883年，幼年隨父李烱居住臺灣省新竹、苗栗、雲林、彰化諸縣任所。《馬關條約》將臺灣及澎湖列島割給日本後，時任苗栗知縣和基隆巡檢的李烱，與劉永福一起，憑藉臺灣的崇山峻嶺掩護，與日軍的地面部隊展開游擊戰。

後來在清政府的調停下，李烱被接回大陸，告老還鄉。於1898年憂鬱含恨逝世，臨終前遺訓自己年幼的兒子李國堂，「要救臺灣，一定要先救中國」，必要報考軍校。

李國堂於1904年畢業於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第16期駕駛班。1905年12月，派赴駐滬英

³⁵章玉蘭，《臺灣人的故事之三》，(Facebook，2016年6月12日)。

艦見習 2 年。1911 年 1 月任職「海圻」巡洋艦，隨艦遠航歐美。

1928 年 3 月，李國堂任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海軍署參事。1933 年 7 月 15 日，出任國民革命軍海軍第三艦隊長山島辦事處處長。1936 年任中央海軍軍官訓練團主任教官、副教育長。1941 年，出任海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議。1945 年 8 月 11 日調任馬尾要港司令。

(二)林如堉

林如堉，1924 年生於臺灣板橋，1937 年以第 2 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海山小學校後，順利考進臺北二中；此時，日本開展「皇民化運動」。1942 年 3 月，臺北二中畢業後，林如堉前往東京報考第一高等學校；落榜後，他並沒有馬上回臺灣，仍然滯留東京，並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進修。

1943 年，林如堉考取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就讀。9 月 23 日，臺灣總督府發佈臺灣人實施徵兵制度的辦法；10 月 25 日，又開始徵召學生兵，同時也取消文科大學生緩徵的資格。林如堉清楚地看到，如果他繼續留在學校的話，早晚也要被徵調去當日本兵。

於是，林如堉離開了上海，隻身先坐船到舟山群島，然後再轉往溫州、永嘉。1945 年春天，林如堉在福州參加海軍，並且一度準備配合盟軍登陸臺灣的計劃，乘坐帆船回臺灣，投入實際的戰鬥。

三、空軍方面

謝文達，1901 生臺灣臺中豐原人，1919 年畢業於「公立臺中中學校」後，赴日本就讀千葉縣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飛行機研究所，以優異成績畢業。1923 年，蔣渭水等人到東京進行第二次臺灣議會運動請願期間，謝文達駕駛「臺北號」飛機，在東京上空散發數十萬張傳單，同年 4 月 12 日渡海前往大陸。

1925 年 6 月起，謝文達先後任河南國民 2 軍航空隊長、1926 年 3 月任廣州航空學校教官、1927 年任國民革命軍航空處飛航員、1928 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航空署航空第 1 隊飛機師、航空署編審委員會委員、航空署第 6 隊作戰參謀、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 9 期航空教官、航空委員會江西星子縣水上機場場長等職務，1936 年 4 月 30 日以少校官階退役。謝文達加入國民革命軍，參與北伐。空軍最早期的飛行員毛邦初、張廷孟等，都是他的學生。

1932 年「一、二八」淞滬事件，日本當時派出 2 艘航空母艦及 1 艘水上機母艦，其艦載機總兵力已經與當時的國府航空戰力相當，威脅極大。當時由航空署署長黃秉衡指揮對日作戰，而作戰參謀就是當時在大陸的「臺灣第一位飛行員」的謝文達。

四、情報作戰

(一)謝東閔：軍事訓練委員會，少校秘書。

(二)李萬居：軍委會粵港區辦事處少將主任。

(三)翁俊明：中國國民黨組織負責人。

(四)劉啟光：軍委會臺灣工作團少將主任。

(五)陳哲生：香港組織負責人。

抗戰期間，謝東閔、李萬居、劉啟光、翁俊明、陳哲生等人都在香港；「香港」是國民政府借重臺灣同胞的中日文雙語能力，從事對日本情報工作的地方。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國政府在香港「郵政總局」內設立了「郵電檢查處」，對經過香港的各國郵、電、書刊進行檢查。在日本尚未對英國作戰前，英國人已感受日本的嚴重威脅，便開始積極蒐集日本情報，並將日文郵、電、書刊列為檢查重點。

謝東閔，臺灣彰化二水鄉人，曾在「郵電檢查處」擔任日文郵、電、書信的檢查工作。英國人對日文的郵電檢查，是事先交給謝東閔一份名單，名單上有名字的往來日文郵件，一律拆開檢查。未列在名單內的日文郵件，檢查與否，則由謝東閔決定。

於是，謝東閔遇到有情報參考價值的日文郵件，就秘密抄一份，轉交給當時在香港負責蒐集情報的臺灣雲林人李萬居。李萬居再將情報轉往重慶隸屬軍事委員會，直接受命於蔣委員長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處理。

此外，當時在香港還有另一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佈建的情報網，當時朱家驊派臺灣臺南人翁俊明為駐香港單位的負責人，以行醫方式掩護工作，期間曾派人回臺灣蒐集情報，轉呈重慶。當時臺灣嘉義人劉啟光為書記，臺灣雲林土庫人陳哲生負責組織工作，並奉命潛伏在香港的日文報社工作，伺機蒐集情報。

(六)連震東

連震東為連橫之子，1904年生於臺灣臺南，1929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回到臺灣後加入《昭和新報》。1932年6月，連震東隨國民黨元老張繼從北平到達西安。經由張繼舉薦和安排，連震東曾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陸軍官校西安分校「敵情」教官等職。在陸軍官校西安分校時，連震東的軍階為少將。

連震東之後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通過對日本股市行情（情報由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站提供）分析，得出日本經濟崩盤、戰爭敗局已定的結論，引起「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重視。

(七)彭盛木

彭盛木字定之，臺灣新竹人。彭盛木曾任軍統局南京站上校組長，由軍統局總部派出潛伏在汪偽政權內部，為周佛海的機要秘書，並將他獲得的重要情報轉報重慶。

(八)藍敏

藍敏1921年生，臺灣省屏東里港人。日據時期，藍家即為顯赫的家族，其兄藍家精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轉赴上海，出任汪精衛偽政權參贊武官公署少將武官。

藍敏自臺北一高女畢業後，即赴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後因父喪極為哀痛，決心放棄學業轉赴上海。1942年4月19日藍敏與其他4名男性友人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重慶。1943年6月12日藍敏與戴笠見面，接受任務後，藍敏利用其兄藍家精的專機不受日方檢查之便，帶一發報機回臺開展工作。

(九)臺灣義勇隊

臺灣義勇隊對前線敵人或偽政府地區，採取各種手段，開展情報工作。主要有：1.偽裝走私船（即持有敵偽許可證之所謂交通船或情報船）；2.派隊員潛入敵後，利用村民打探消息；3.以重金賄賂敵偽中下級人員盜賣良民證，以便往來無阻；4.潛入敵偽軍事或行政機構內供職，暗中打探消息；5.潛入敵偽佔領區內其他職業團體內部工作，成功地為國軍提供了大量情報。

臺灣義勇隊收集敵偽情報，提供有關方面參考，至臺灣光復仍未停止。例如：1945年9月，臺灣日軍不甘心失敗，進行陰謀活動，臺灣義勇總隊獲得情資後，即刻向軍事委員會報告。在軍事委員會致行政院「有關防備日本在臺活動快郵代電」中稱：據本會政治部轉據臺灣義勇隊李隊長申巧電略稱：「敵在臺策劃陰謀：（甲）日臺浪人組織暗殺團，準備阻止我赴臺接受人員及作種種破壞工作；（乙）目前臺灣全部交通已統制為軍用；（丙）積極秘密破壞軍事設施；（丁）教唆無知臺民積極倡導臺灣獨立運動以作誘惑。」對上述這些重要情報，軍事委員會除轉告行政院外，另分電有關機關引為重視。例如，臺灣義勇總隊因及時掌握了日軍人的陰謀活動，使日本導演的第一場「臺獨」醜劇「胎死腹中」。³⁶

(十)林頂立

林頂立為軍統局在日本特高課中最出色、最隱蔽的情報人員。他對於戰時經濟作戰及中美情報合作，皆能從內部預先獲得準確、快速的情報，提供軍統單位，以資應變之用。互抗戰全期，林頂立在情報戰場上的作為支撐了重要的軍統情報、經濟作戰。表現出色，可圈可點。

(十一)劉戈青

³⁶樓子芳，《抗日烽火中的臺灣義勇隊》，（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2003年7月），頁182-183。

劉戈青任軍統局上海站行動組時，率人暗殺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制裁漢奸行動，不但鼓舞了抗戰的民心士氣，也令日偽當局倍感震驚、為之喪膽。

柒、結論

綜上所述，姑且不論臺灣當時在日本嚴厲而高壓的掌控下要抗日的困難度，更可貴的是，臺灣同胞自始至終就有不接受異族統治的心理。從知識菁英的覺醒，到農工商各階層的呼應，臺灣同胞的抗日行動可說是自動自發、爭先恐後，其志可嘉，其行可佩。

僅以臺灣的人口比例，能有這麼顯著、重要抗日事實，臺灣同胞對抗日的貢獻可謂很大。當然不僅如此、不只上面所述；原由：抗戰勝利隨即國共內戰導致兩岸長期動盪、對峙，沒有研究環境與空間；如今兩岸趨穩史料浮現、口述補強、研究強化，必將更能證明在抗戰臺灣同胞是功不可沒。對臺灣同胞的抗戰史的研究，猶有諸多未盡之處，尚有賴諸君子的同心協力。

The contribution of Taiwan compatrio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Jing-Yu, Wang
Adviser, 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a and Japan exerted all their national strength to the fighting. The strength is recognized as the four-level “State strategy.” First, politics: the meaning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that is, to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our regime to combat and destroy hostile regimes. Second, economy: to improve our economic strength and weaken the enemy's economic power. Third, psychology: referring to the mentality and the morale of the public in general; to show our power through soci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paganda in order to destroy and undermine the enemy's morale. Lastly, military: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ces to create favourable conditions to support national strategies.

This article primarily exam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aiwan compatriots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objectively shows their specific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four levels, namely politic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military.

Keywords: National Strategy, Lin Yutang, The 63 law, Taiwan volunteer Team

參考文獻

壹、著作

- 嚴秀峰，2007。《跨越海峽的情懷一名女戰士的自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薩蘇，2009)。
《尊嚴不是無代價的》。(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
- 藍博洲，1994。《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業有限公司)。
- 戴月芳，2014。《蔣渭水 VS 林憲堂一兩位臺灣民族運動先驅》。(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劉鳳翰，1997。《日軍在臺灣(上、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臺北：國史館)。
- 樓子芳，2003。《抗日烽火中的臺灣義勇隊》。(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
- 楊儒賓，2015。《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
- 喬家才，1981。《浩然集(一)鐵血精忠傳》。(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
- 喬家才，1981。《浩然集(二)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
- 陳正平，2000。《李友邦與臺胞抗日》。(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
- 周法平，2009。《臺灣道聽途說可信嗎？》。(臺北：大遠出版有限公司)。
- 吳克泰，2002。《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版社)。
- 寺奧德三郎，2000。《臺灣特高警察物語》。(臺北：文英堂出版社)。
- 汪知亭，1962。《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書店)。

貳、論文集

- 葉榮鐘，2002/3。《葉榮鐘早年文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許介麟，2007/7。《臺灣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 1、2、3》。(臺北：文英堂出版社)。
- 徐康，2015/9。《臺灣抗日人物集之一、之二、之三》。(臺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徐康，2015/9。《臺灣抗日團體》。(臺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徐康，2015/9。《臺灣共產黨抗日史實》。(臺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臺灣義勇隊、臺灣少年團合編，2003/1。《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
- 臺灣義勇隊、臺灣少年團合編，2003/1。《紀念李友邦先生文集》。(臺北：世界綜合出版社)。

參、期刊

- 嚴秀峰，2004/5。《臺灣先鋒上卷—第一期～第五期》。(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嚴秀峰，2004/5。《臺灣先鋒上卷—第六期～第十期》。(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肆、列傳

- 丘秀芷，2014。《破碎山河誰來補？》。(臺北：臺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肆、口述歷史

- 許雪姬，1997/6。《柯台山先生訪問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口述歷史叢書 63)。

伍、檔案

- 福建省檔案館編，2007。《臺灣義勇隊檔案 1937～1946》。(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